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编

现代化研究

STUDIES OF MODERNIZATION
THEORIES & PROCESS

第一辑



商務印書館

现代化研究

第 一 辑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编

商務印書館

2002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研究. 第1辑/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ISBN 7-100-03571-6

I. 现... II. 北... III. 现代化—研究—文集
IV. F1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42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XIÀN DÀI HUÀ YÁN JIŪ

现 代 化 研 究

第 一 辑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571-6/K·745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1/8 插页 1

定价:30.00 元

封面题字 罗荣渠

学术顾问 郭传杰 于维栋 王玉民 何芳川 林被甸
丁建弘

编委会 钱乘旦 杨奎松 周积明 许志宇 何晓明
虞和平 王加丰 吕一民 哈全安 石冰山
常绍民 何传启 谢文惠 朱庆芳 吴述尧
邹兆辰 杨玉圣 严立贤 尹保云 王红生
牛大勇 高岱 王新生 包茂红 赵自勇
刘一皋 梅俊杰 董正华* 牛可* 董经胜*
(带*号者为常务编委)

助理编辑 安然 周东华

联系地址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北大静园二院)

电话/传真 010-62751658

电子信箱 hiszrk@pku.edu.cn; xdhlt@sina.com.cn

订购地址 100710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发行部

电话 63044891 83164425

稿 约

《现代化研究》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热土,同时关注世界现代化的大趋势,为研究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的中外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园地。

《现代化研究》坚持严谨的学风和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遵循不同学术观点自由讨论、文责自负的原则,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课题,强调理论思索与经验性分析的结合,以学术创新与时代共呼吸。

《现代化研究》常设主题研讨、学术专论、政治与经济、国际比较、社会文化、区域发展、农村发展与政策动向、调查报告、书评、短论、学术批评以及现代化研究论著索引等栏目。

《现代化研究》每年两辑,分别于2月、8月出版。文稿长短不作硬性规定。尤其欢迎青年学人的清新文字和有思想深度的短文。文章刊发即付稿酬。请勿一稿两投。

来稿请寄:北京大学静园二院现代化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100871 **电话/传真:**010-62751658

电子信箱:hiszrk@pku.edu.cn, XDHLT@sina.com

第一辑(创刊号)

目 录

学术专论

- 杨奎松: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
——读胡绳遗稿札记 (1)
- 牛 可:历史对发展意味着什么? (21)
- 韩毓海:社会自由理论的几个问题 (53)
- 何晓明:再论文化保守主义 (82)
- 朱荫贵:“官利”制度及其他:近代中国企业的资金运作 (106)

主题研讨:现代化理论

- 钱乘旦:再论“反现代化”
——理论构建与实例分析 (123)
- 尹保云:经济现代化的三个层面 (138)
- 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
——兼谈世界现代化研究的三个新热点 (148)

经济与社会:“三农”研究

- 张 强:中国都市型农业发展的实践与理论 (165)
- 刘一皋:工业化村庄中的组织重建 (182)

各国研究

- 张 洁:印尼威权统治结束后的亚齐分离运动 (201)
- 郑振成: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影响 (232)

2 现代化研究(第一辑)

张健康:80年代以来印度的电子工业政策及其结果 (263)

思考·评论

杨玉圣:现代化研究——从学科建设的视角观察..... (283)

邹兆辰:宏观视野下的当代中国现代化史学..... (292)

安 然:在断裂与连续之间——评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305)

新书传真

周东华:尹保云著《什么是现代化》等..... (319)

论著索引

现代化研究论文及著作索引(1998) (341)

短讯 (350)

稿约 (351)

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

——读胡绳遗稿札记

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一

近来,有幸读到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为编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而进行的十次谈话。^①(此谈话于胡绳先生去世后始得发表,以下姑且称之胡绳遗稿。)读过胡绳遗稿,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一直在努力尝试着从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近代历史。自改革开放、邓小平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举国上下以实现现代化为奋斗目标以来,在历史学界主张应当以同样的标准来反思和检讨近代历史者,胡绳先生可谓倡其先者。他今天所做尝试步幅之大,甚至又大大超过了他以前曾经提出的一些看法。^②而在刚刚发表的胡绳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十次谈话中间,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其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明白地告诉人们:中国革命客观上就是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③这大概是胡绳先生临终前几年反复研究、深入总结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之后,所得出的又一个十分新颖和大胆的结论了。

① 见《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书中除录有胡绳先生谈话外,并附有根据胡绳先生意见起草的《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部分初稿。

② 读过胡绳先生《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载于1987年3月1日《人民日报》)一文的读者当能记得,十多年前胡绳先生就已经尝试着主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解释中国近代史了。

③ 胡绳前引书,第51页。

胡绳先生是怎样说明他的这一观点的呢?概括言之,胡绳先生认为: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惟一进步的道路”,也是得到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同情和支持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因为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会失败,正是因为它与帝国主义和封建^①势力有着太过密切的联系,它只能在基本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然发展不起来。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胜利,则恰恰是因为它坚持彻底反帝反封建,推倒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座大山,毛泽东又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因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的中间势力。^②

胡绳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过去传统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最大蹊跷一个区别就在于,过去我们通常是以1949年划线,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1949年以后就是社会主义的了。为什么不经过资本主义,一步就跃进到社会主义?理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由此出发,中国近代史自然也只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分水岭,用胡绳先生概括后的话来说,就是“五四运动以前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好的;‘五四’以后不是了,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再主张资本主义,就是反动的了。^③殊不知,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从1949年10月中华

① 本文所使用的“封建”概念,无论引文内外,均系依据胡绳文中的概念而引用,并非意味着笔者同意中国社会具有欧洲意义上的封建性质。

② 胡绳前引书,第5、15、30—32、33—34、45页。

③ 胡绳前引书,第43页。

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的社会性质其实是新民主主义的,在迈进社会主义之前,经过这一过渡阶段是完全必要的,1955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原定15年的过渡期一下子缩短为一年半,多少犯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①这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早已明确肯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迈进社会主义之间,是有过并且也是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的。说中国不应该经过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宣称中国实际上一大步就跨入了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

强调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迈进,客观上需要一个中间的过渡阶段,这是与毛泽东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密切相关的。新民主主义说的核心之点就在于,承认并且肯定落后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必须首先通过加速发展生产力造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要想迅速发展生产力,也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开放经济和充分借鉴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帮助,才有可能。一句话,“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②但是,承认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生产力的过渡时期,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我们过去对历史的解释多少有些简单化,需要有所改变。显然,胡绳先生极为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谈话中说,不能简单地认为“五四”运动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前途了。尽管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制,资本主义仍旧是中国当时条件下社会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并且是受到足以影响国共两党命运的广大中间势力的欢迎的。不仅如此,“五四”以后的中国也并不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了。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既反帝,又反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发展就有了条件”。“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后阶段,搞了“双十协定”和政协五项决议,共产党是准备付诸实践的,当时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8页。

^②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在内部就明确讲过以后要准备用选票代替子弹了。“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是搞资本主义”。“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定,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①

为了印证自己的这一观点,胡绳先生在谈话当中还反复举了中间势力的态度变化为例子。他指出:过去讲这段历史,动辄就是国共斗争,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只是社会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正如胡乔木说过的,“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而“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27年国共分家,中间势力为什么拥护南京政府?就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国民党能够统一中国,从而便利中国走向现代化。抗战结束后中间势力为什么逐渐倒向共产党一边,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蒋介石“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相反,“这时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地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极大地满足了中间势力的愿望。因此,胡绳先生的观点很清楚,那就是:“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五四运动”以后,问题并不在于谁讲资本主义,谁讲社会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谁能真正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他们最后所以选择了共产党,正是因为他们最终发现不能再指望国民党,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有可能迅速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因为国民党既不能彻底反帝,也不能彻底反封建,不能真正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土地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帮助中国资本主义顺利发展。只有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共产党才能真正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土地问题,从而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②

① 胡绳前引书,第13—15页。

② 胡绳前引书,第2、15、45页。

二

作为一篇谈话记录稿,生前又未能经过作者修订校正,胡绳遗稿在文字表达、观点概括以及史实说明上,可能存在着某些不十分准确和严谨的地方。这是需要首先加以说明的。比如,在整个 20 世纪前半期,面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物欲横流、弱肉强食和危机四起的混乱状况,中国广大中间势力,亦即胡绳先生所说“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以及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是否主观上倾向于认定资本主义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恐怕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至少,根据笔者多年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体会,情况似乎并非完全如此。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注意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帝国主义列强围攻、封锁的重重压力之下,自力更生地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稳步迈向现代化的情况,中国不少中间势力的人士和党派团体都曾对社会主义抱以某种程度的同情与向往。一些中间党派还在自己的政纲中鲜明地写上了社会主义的未来目标。^① 1949 年新政协召开,讨论《共同纲领》时,也主要是一些民主派人士积极主张应当在文件上写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② 换言之,即使在 1949 年以前,中国究竟是通过资本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好,还是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好,就广大中间势力而言,也还是一个引起相当争议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舆论中存在着不喜欢资本主义,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也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不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人后来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多少差异,共产党人的胜利未必与其自身的社会主义标志毫无关系。泛泛地谈论中国中间势力“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观倾向,容易造成谁能够实行资本主义,中间势力就跟谁走的印象。比

① 可参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革命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之政纲文件。

② 参见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1949 年 9 月 22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17 页。

较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撰稿并亲自审定发表的谈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相关文章,似乎不能认为这就是胡绳先生的本意。

那么,胡绳先生在这里想要说明的主要意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胡绳先生讲话的前后逻辑,我们不难发现,他这里所强调的,其实并不是“主义”问题,而是走什么道路才真正有助于国家富强的问题。换言之,在他看来,在20世纪前半期,摆在中国志士仁人面前最大的问题,只是如何使积贫积弱的国家能够迅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重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围绕着“主义”问题的争论,更多的不过是在方法和手段问题上的见仁见智罢了。在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方式,在推进国家现代化方面均各有所长,影响到中国的中间势力只能依据耳闻目睹的体验。有倾向资本主义方式者,有倾向社会主义方式者,也很自然。在这里,影响人们选择倾向的主要因素,更多的只是在于采用哪种“主义”能够在中国以最快速度,花最少代价实现现代化。诚然,由于教育背景、利益关系等等的影 响,人们对于所需付出代价的心理承受力会有很大不同,这也正是胡绳先生更强调中间势力“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的重要原因。但无可否认,这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什么主义,即像胡绳先生自己所说:“在‘五四’以后,问题倒不在于谁讲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得厉害,到底是主张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关键在谁更能便利中国走向现代化。^①

“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这是胡绳遗稿中所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样的观点,自然也不是胡绳先生自己的创造。就像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观点一样,它们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并不因为其一穷二白就更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列宁早就告诫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是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

^① 胡绳前引书,第45页。

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而“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①毛泽东也公开讲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一个资本主义而不可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②

但是,“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却未必是一个准确的科学概括。^③这是因为,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不具有确定的内涵。它是指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力?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其自身早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看到“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乃至列宁当年所谈论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究竟何为资本主义,何为社会主义,在今天无疑是一些需要重新深入探讨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14页。

② 转见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329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53—56、100—101、126—127页。

③ 鉴于此遗稿是胡绳谈话记录稿,故文字方面不十分严谨。这里所讨论者相信并非胡绳先生准确概括后的语言。有关胡绳先生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系统论述,可参见胡绳先生近些年来已发表的其他文章。

承认传统的对资本主义概念的定义,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实践之后,也没有谁能够简单地断言,推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只有靠资本主义私人资本自由竞争的一种方法,靠社会主义国家积累计划经济的方法,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条件下,就一定毫无效果。十分明显,当年列宁和毛泽东谈到需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也只是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谈问题的。因为每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都了解,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成员的基本成分还是农民的落后国家中,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即使共产党能够造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如果不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 30 年后,邓小平还在反复告诫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还不够格”,必须要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①

如何才能有效地迅速发展生产力呢?这才涉及到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然而,在共产党人看来,这却更多的只是一个手段问题,不过是学习、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一切有效方法而已。无论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胡绳作为共产党人,自会得出在他所谈论的那个时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最便利也是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方法,就是坚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观点。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②从这样一种分析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对胡绳先生来说,说“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确不如说“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更准确一些。虽然,胡绳先生所谈到的“现代化”,的确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为标志的,它并非可以通过自发的方式或由外国和平输入来轻易完成,非根本变革整个社会关系以及

^① 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1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7页。

生产关系不能有所建树。所谓“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亦即为此。但“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与“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两个断语的着眼点却大不相同。前者是着眼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后者却是着眼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事实上,即使从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150年来,不仅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概念严格界定起来相当困难,而且是否能够创造出适合资本主义水平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有利社会条件,也未必一定要照搬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中共建国初在经济恢复与建设方面的成功尝试,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六七十年代经济的腾飞,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充分体验到生产力在社会和国家发展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之后,今天多数的中国人显然都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的前途,乃至人民的福祉,必须首先取决于它在彻底告别农业文明,实现现代化方面,能够以怎样的速度赶上世界次发达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不论我们是否完全赞同胡绳先生使用的历史概念和他对历史的解释,我们还是很容易理解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所极力尝试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用心,并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毕竟,现实生活早已清楚地向历史学家提出了理应由他们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即何以用了150年的时间,中国至今仍然远远落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后面?为何中国近20年的发展速度,竟远远超过了过去的100多年?为什么中国不能早些走上更适合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呢?然而,迄今为止,普通的中国人还只是在根据自身的体会和经验来得出个人的看法,还没有哪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能够有系统地给读者提供有充分历史依据的答案。

现有的近代史专著不能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着眼点往往只是停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没有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它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站在今天历史高度的人们正在关心

的问题,而仅仅局限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矛盾冲突的表象上面。像过去近代史研究中经常讨论的“一根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像近、现代史争论中究竟应当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应当以新旧中国的更替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像今天许多学者坚持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只能以阶级斗争为考察的主张,反对突出现代化的需要,甚至把革命问题与现代化问题对立起来,如此等等,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的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所讨论的内容,还太过于偏重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问题,太少关注今天人们所关心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问题。

偏重于研究中国革命,这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所使然。因为任何历史学家都只能面对历史已经提出的问题。但正如罗荣渠教授所说: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这种研究虽有必要,却过于偏狭。罗教授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就此有过一段评论。他说:“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近代中国被外国的侵略伤害得太厉害了,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革命毕竟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况且即使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深不透的。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①

太过于偏重特定时期的特定矛盾冲突,也无助于贯彻共产党人所强调的唯物史观。因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只有把复杂的政治斗争还原为社会最基本的矛盾状况,才能够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具体地解释过他眼中的社会革命的发生原因。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